

全国政协委员曲永义：数字经济是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曲永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

本报记者 杜丽娟 北京报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层次与支撑体系看，产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而数字经济是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近年来，我国数字产业化取得显著进展，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兴数字产业异军突起。统计显示，数字经济规模从2016年的22.6万亿元增至2021年的45.5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也从32.9%提升到39.8%，总量稳居世界第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曲永义认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先机的核心要素，这有利于推动产业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对我国而言也是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

政策支持也让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将发展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为我国产业抢占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下好新一轮产业国际竞争“先手棋”、打造产业未来发展制高点打下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政策支持也让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网络强国战略实施纲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

增强产业创新能力

依靠数字创新中的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为数字经济驱动下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动力和技术支撑。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数字经济对产业发展的价值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治理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

曲永义表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发展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由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和新冠疫情冲击，发展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数字经济驱动的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我国产业体系迈向现代

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强化大型支付平台企业监管促进支付和金融科技规范健康发展工作方案》等纲领性和规范性文件，这使全社会对数字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政策性文件的出台，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曲永义介绍，数字经济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产业形态是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前者主要是数字技术驱动的全新兴产业业态，具体包括软件业、电信业、电子

化进程任重道远。

举例来看，在我国产业发展中，技术研发与需求之间的缺口还很大，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中的科学基础研究、底层核心基础技术、工艺能力等不同的知识和能力集成不足，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开发平台、基本算法、核心基础元器件等瓶颈仍然突出。

此外，人力资源、设备、软件、数字基础设施、应用场景等不同要素资源系统互动不够，关键技术受国外技术垄断或技术封锁的限制仍未获得根本性突破，部分战略性

信息制造业和互联网行业等，后者主要是传统产业嵌入数字技术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产业，传统产业立足数字技术应用实现产业增值与效率改善。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球领先，并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和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移动千兆(5G)和固定千兆(光纤)接入用户规模均居全球第一。

同时，产业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更多企业迈上“云端”，大数据产业规模快速增长，这一数字从2017年

产业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面临严重的“卡脖子”问题。

对此，曲永义认为，在产业创新层面我国需要持续加强全面自主创新体系建设，把数字经济发展作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依靠数字创新中的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为数字经济驱动下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动力和技术支撑。

他建议，当前需要瞄准我国产业发展的数字科技需求缺口，增强产业创新能力。

一是明确我国数字科技发展

的4700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3万亿元。随着数字经济总体规模占GDP比重的不断攀升，我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进程也不断加快。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逐年攀升。从数字产业化的发展进程来看，2021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为8.3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1.9%，占数字经济比重为18.3%，占GDP比重为7.3%，数字产业化发展正经历由量的扩张到质的提

现状及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选择优先发展的关键技术群，瞄准传感器、量子信息、网络通信、集成电路、关键软件、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新材料等战略性前瞻性领域，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

二是按照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预测技术发展趋势，形成“技术跟踪—技术预测—技术选择和规划—行动(技术开发和商业化)”的发展思路，集中突破硬性产业高质

升的转变。

从产业数字化的发展进程来看，2021年，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37.18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7.2%，占数字经济比重为81.7%，占GDP比重为32.5%，产业数字化转型持续向纵深加速发展。

量发展的高端芯片、操作系统、工业软件、核心算法与框架等关键核心技术，加强通用处理器、云计算系统和软件关键技术一体化研发和跨越式发展的“撒手锏”。

三是实施产业链强链补链行动，加强面向多元化应用场景的技术融合和产品创新，着力提升基础软硬件、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生产装备的供给水平，强化关键产品自给保障能力，完善5G、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重点产业供应链体系，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竞争力。

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在预期引导、精准发力方面显著增强

本报记者 谭志娟 北京报道

近五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2022年我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120万亿元，达到121万亿元，这是继2020年、2021年连续突破100万亿元、110万亿元之后，再次跃上

新的台阶。

在业界人士看来，经济高质量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尤其是货币政策的支持。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通过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积极推进以利率等为核心的金融市场化改革，不断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

环境。

央行近日发布的《2022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表示，过去五年，人民银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始终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稳”的支撑。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近五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

调控工具不断丰富，各项政策工具向实体经济传导顺畅。同时，货币政策调控框架逐步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货币政策调控在预期引导、精准发力等方面显著增强。此外，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提升，也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市场主体对利率敏感度提升等息息相关。”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叶银丹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总体来看，2018年以来，我国稳健货币政策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实现发展较快、就业充分、物价稳定的优化组合。2018~2022年，在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各项宏观政策支持下，我国GDP年均增速超过5%，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年均新增城镇就业超过1200万

人，较好地实现了就业目标。此外，2022年，我国CPI同比上涨2%，远低于8%以上的全球平均通胀水平，在全球高通胀背景下保持了物价基本稳定，过去五年、十年CPI平均通胀率也均为2%左右，实现了主要经济体长期追求的2%通胀目标，居民通胀预期保持平稳，为中长期物价基本稳定奠定了基础。”

稳固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

如何看待这五年我国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取得的成就？

叶银丹对记者表示，“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稳固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2018年以来累计实施14次降准释放长期流动性超11万亿元，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再贷款等工具，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在央行资产负债表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2018~2022年M2年均增速为9.5%，与同期7.8%的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并适当提高，有力支持了宏观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具体来看，在叶银丹看来，一是2020年，面对疫情冲击，我国央行果断采取多种措施，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释放1.75万亿元长期流动性，分层次有梯度出台合计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有力支持抗疫保供、复工复产和经济发展，助力我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二是2021年，基于我国经济增速前高后低的形势变化，主动用好

再贷款工具，做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直达工具的延期和市场化转化，在引导货币信贷增长回到常态的同时，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为跨年度政策衔接和下一阶段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做好铺垫。

三是在2022年以来，在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背景下，央行及时调增政策性开发性银行信贷额度8000亿元，推动设立3000亿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随后新增3000亿元以上额度，

支持金融机构加快中长期基础设施贷款投放节奏，积极匹配基建项目融资需求，助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在这方面，《2022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还指出，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充分发挥货币信贷政策效能，重点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积极创新和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过去十年，我国逐渐构建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重点支持普惠金融、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国民经济发展当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兼具总量调节和结构性调节双重功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22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通过结构性工具既能够实现精准滴灌的政策效果，又能够对总量调控作出贡献。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数量和投放规模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可与总量型政策工具形成一个良好的配合。

叶银丹对记者表示，在“稳”的基础上，近年来，人民银行积极创新和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2018年以来，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聚焦重点、合理适度、有进有退”，发挥总量、结构、价格三重优势，统筹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促进金融资源向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截至2022年末，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约6.4万亿元，约占人民银行总资产的15%。

在叶银丹看来，“这些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助力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支持特定行业及企业、化解潜在风险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

叶银丹还举例说明：首先，在2018年，信贷、债券、股权“三支箭”政策组合，有效助力扭转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同步收窄局面。2020年疫情暴发后，从供给端入手保市场主体，分阶段推出3000亿元、5000亿元

和10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越来越市场化，政策覆盖面越来越广。

其次，设立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直达工具，到期后接续转换为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加大。

最后，2021年以来，创设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科学有序助力绿色发展；推出科技创新、普惠养老、交通物流、设备更新改造等专项再贷款，强化对重点领域的精准支持；指导设立两批次共7399亿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撬动有效投资；适时出台3500亿元保交楼专项借款、2000亿元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支持房地产市场稳健运行。

叶银丹还表示，近五年来，人



2023年将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分析称，2023年将继续加大对“两新一重”等新动能领域的信贷支持。视觉中国/图

推动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记者注意到，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利率传导效率，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201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

贷款定价锚由此前的贷款基准利率转变为LPR，而LPR直接挂钩人民银行政策利率——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有分析称，当前MLF利率—LPR—贷款利率的利率调控传导路径明显更为市场化，也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更为及时和有效。

叶银丹告诉记者，“我国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通过创新实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健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等方式，引导实际贷款利率稳步下行。面对主要发达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的挑战，从优先确保国内发展的角度出发，没有选择跟随

加息，在降息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仍适度引导政策利率下行，确保利率处于合理区间，以首先适配稳定国内需求和就业的需要。”

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的政策效果明显，这从数据可见：企业贷款利率由2018年高点5.60%降至2022年12月的3.97%，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从5.75%降至4.26%。

《2022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还指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持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精准有力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引导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激励引导作用，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稳”的战略支撑和“进”的战略空间，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